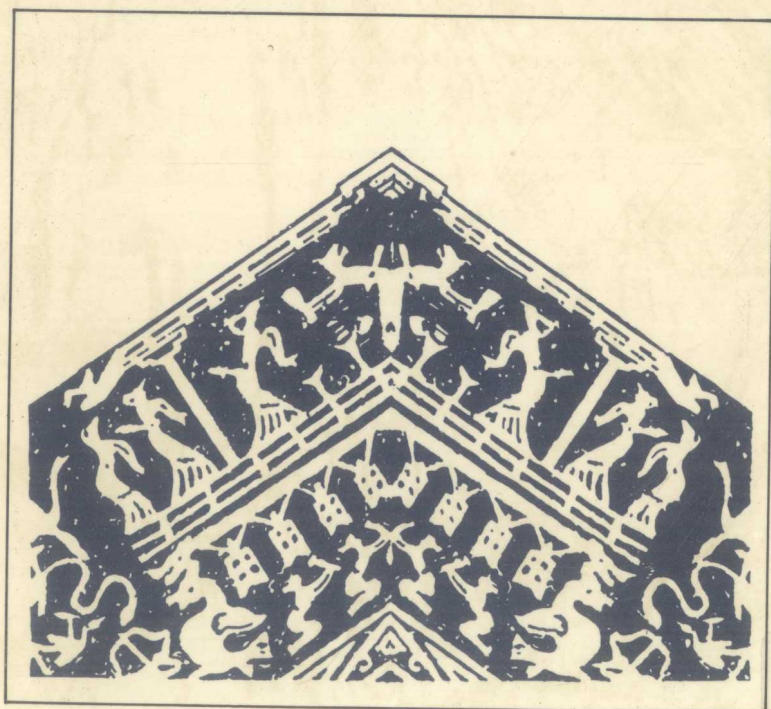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楊亮先生九秩華誕紀念論文集

中國教育的展望

編輯小組主編

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

G4-53
8814

S016046

楊亮功先生九秩華誕紀念論文集

中國教育的展望



編輯

朱宜先生贈書

主編

年 月 日



S9003090

中國教育的展望

中華民國73年7月初版
中華民國75年4月再版

著作者 編輯 小組
發行人 楊 榮 川
發行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

局版臺業字第0598號
臺北市銅山街1號
電話：3916542
郵政劃撥：0106895-3
印刷所 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632號
電話：9951628 • 9953227

基本定價：精裝 7.78 元
平裝 6.67 元

(本書如有缺頁或倒裝，本公司負責換新)



楊 亮 先 功 生 近 照

楊亮功先生與中國現代教育(代序)

伍振鵠

皖巢楊亮功先生，生於民前十七年（光緒二十年，西元一八九四年）六月十八日，本年七月十六日，適逢其九十大慶；師大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歷屆畢業學生，忝列門牆，親炙教誨，每於先生「學不厭、教不倦」之精神，莫不深致其「高山仰止」之讚嘆，因議以「中國教育的展望」為題，徵文為先生祝嘏。茲各學長大作宏文貴頌，編集成冊，爰以「楊亮功先生與中國現代教育」一文弁於前，非敢言序，謹申嵩祝。本文內容分為三部分：一、中國現代教育的演進，略述中國近百餘年各時期教育演進的大略；二、楊先生的參與及貢獻，擇錄楊先生參與各時期的教育活動及其所作的貢獻；三、中國教育的未來展望，則綜合諸學長文中檢討與建議的要點，並參照楊先生平日所發抒的卓見，指出我國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。

一、中國現代教育的演進

自清末迄今，中國近百餘年來的歷史，可說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。而在此百餘年的現代化過程中，中國教育的現代化，不可否認的，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。所謂中國教育的現代化，簡言之，即揚棄中國過去的傳統，轉而模仿西方，興辦與傳統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；無論自形式或內容而言，

均與前此迥然有別。這在中國教育史上，實爲劃時代的變革。

有關中國現代興辦新式教育的諸多時代背景與各種因素，姑且不論；這裏僅簡述中國現代教育演進的概略情形。大較言之，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，依照時間的順序，可以分爲幾個彼此雖然釐然不同但又難以截然割裂的階段。第一個階段，自同治元年設立京師同文館，至光緒末造兩次訂頒學堂章程，一切均屬草創，所辦理的各種學校，體系零亂，各自爲政，然却爲中國現代的教育奠下了基礎，可稱爲草創期。自光緒二十八、九年分別訂頒欽定與奏定兩學堂章程，至北伐成功後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，爲第二階段，一方面由於時局多變，一方面導因於思想的激宕，所有各項教育設施，不論教育宗旨、行政體制與學校制度，均多所更張，時有調整，可稱之爲過渡期。自北伐成功至今，爲第三階段，教育宗旨既經確定，便迭無更改，教育政策、行政體制與學校制度，間或小有變動，但基本精神仍屬一貫；在此期間，尤其是政府遷臺三十餘年，教育事業一直在穩定中求發展，並不斷進步，是爲健全期。茲分述於次：

(一) 草創期

如前所述，由於此一時期一切均在草創階段，故所辦理的學校，不但體系零亂，而且各自爲政，左右既不溝通，上下亦不連貫，多係爲特定目的而興辦的一級制學校。屬於此一時期興辦的學校，以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年）創辦的京師同文館爲最早，其後屬於相同性質（外國語文）的學校，尚有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年）設立的上海廣方言館，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年）設立的廣州同文館，以及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年）興辦的湖北自強學堂（亦稱方言學堂）等。除外國語文的學校而外，此一時期

興辦的其他性質的學校尚多；其屬於實業性質的，有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年）的福建船政學堂，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年）的上海機械學堂，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年）的天津電報學堂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年）的上海電報學堂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年）的北洋大學，以及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的湖北礦業學堂等；其屬於軍事性質的，則有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年）的天津水師學堂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年）的廣東水師學堂，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的天津武備學堂，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八年）的湖北武備學堂等；至於屬於普通性質的，則以光緒二十一年的天津中西學堂，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的上海南洋公學，以及同年的湖南時務學堂等，最爲有名。也許此一時期所設立的學校，最爲大家重視，並且也影響後來最大的，乃是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的京師大學堂。因爲京師大學堂不但是我國第一所國立大學，而且當時所訂的「京師大學堂章程」，也是我國最早的學制綱要。唯此一新訂的學制綱要，後以戊戌政變與庚子拳亂而未及實施，因之中國現代教育的學制系統，遂有待光緒二十八、九年的欽定與奏定兩學堂章程頒布後，始克建立。至於此一時期的其他教育設施，如教會學校及留學教育，以篇幅所限，不詳述。

(二) 過渡期

自光緒二十八、九年訂頒欽定與奏定兩學堂章程，以至北伐成功後民國十八年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，二十餘年之間，中國現代的教育，經歷了興辦以來次數最多與實質最大的變革。這是因爲草創期的基礎奠得不好，以致乃有其後二十餘年的過渡時期，不論在教育宗旨、行政體制、以及學校制度方面的不斷調整與改變。

首先，談到教育宗旨的變更。中國現代教育興辦之初，本屬應急措施，一切抄襲模仿，根本談不上遠大理想或教育宗旨。其後奏定學堂章程頒布，其學務綱要曾撮述教育設施要領，但並非教育宗旨。及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學部設立，次年以教育必須「審定宗旨，以定趨向」，乃頒布「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實」五項教育宗旨；為我國現代教育正式有教育宗旨之始。民國六年，國體改變，教育宗旨亦隨之改訂為：「注重道德教育，以實利教育、軍國民教育輔之，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。」民國四年，袁世凱陰謀稱帝，擅改教育宗旨為：「愛國、尚武、崇實、法孔孟、重自治、戒貪爭、戒燥進。」嗣袁氏敗亡，此項教育宗旨無形被廢。其後十餘年間，我國的教育遂淪於一種無目的（宗旨）狀態，如民國十一年之學制改革，僅有改革的標準七項，而無正式的教育宗旨。直到北伐成功以後，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國民政府乃正式公布「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」，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始經確定為：「中華民國的教育，根據三民主義，以充實人民生活，扶植社會生存，發展國民生計，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；務期民族獨立，民權普遍，民生發展，以促進世界大同。」自公布以來，一直沿用至今，迄未更改。

其次，關於教育行政。清末興辦新式教育，並無專設的教育行政機構；僅於京師大學堂開辦之初，派管學大臣一人，兼管大學堂事務及各省學堂。光緒三十一年，學部設立，為我國有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之始。辛亥革命成功，民元臨時政府設教育部，主管全國教育行政。民國十六年，試行大學院制，教育部一度改制為大學院。但不及兩年，仍恢復教育部舊制，一直到今天，未有改變。至省級與地方，以篇幅所限，從略不贅。

最後，在學制方面，此一時期變動最多。首先是欽定與奏定兩學堂章程，為中國現代的學校，奠立學制的基礎；接着民元與民二改訂的學制，對於清末的制度加以修正；至民國十一年「新學制」改革，中國現代的學制乃經歷了最劇烈的變更。新學制係以美國的「六、三、三、四」制為藍本，依據兒童青年身心發展的過程，將學制劃分為初等、中等與高等教育三個階段，而以中等教育階段採取綜合制最具特色。唯此一學制、型態雖新，然施行的結果，並不切合國情，因之乃有其後陸續的修改；有關後來學制的變動，容於下文再述。

（三）健全期

民國十八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，乃依據三民主義，以民生哲學為其理論的基礎，可說是既具備正確的理论體系，又能適應實際情況的需要，一方面有切近的目標，另一方面亦不忘遠大的理想，實為一最正確而又最完美的教育宗旨。故自公布之後，我國的現代教育，即自此步入健全的發展時期，不再徬徨瞻顧，搖擺不定；迄今五十餘年，不僅教育政策堅守此一最高指導原則與方針，就是行政體制與學校制度，除了因為配合政策的推行，間或偶有小幅度的調整外，其基本精神與整體輪廓，亦鮮有斷裂式的變動。在教育政策方面，雖然不同的階段有重點相異的政策，但中心思想與基本原則却一以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為依歸，而絕無逾越。舉例而言，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會議通過的「教育實施趨向」辦法六條，同年六月國民政府公布的訓政時期約法「國民教育」專章，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所制訂的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公布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第一五八條，三十九年六月所訂頒的「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」，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開始實

施的「九年國民教育」，以及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所通過的「復國建國教育綱領」、「光復大陸教育文化重建綱要」與「長期教育發展計劃綱要」等，莫不以三民主義爲其最高指導原則，並以達成三民主義理想的實現爲其終極鵠的。在行政體制方面，一直實行中央、省（市）與地方均權的三級制，僅縣市的教育科（局）現一律擴稱教育局，以利基層教育行政的推展。在學校制度方面，自「新學制」施行後，「六、三、三、四」的基本架構迄無更改，局部的修訂則有：民國二十一年公布「中學法」、「師範學校法」與「職業學校法」，將師範學校、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分開，重行單獨設立；民國二十七年公布「師範學院規程」，設立獨立的師範學院；民國四十九年改師範學校爲師範專科學校；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教，將原來的初中一律改爲國民中學，國民學校亦改程國民小學，而初級職業學校則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停辦。民國七十二年，教育部又成立「學制改革小組」，研擬學制改革方案；初步提出的長程與短程兩種方案，雖於現行學制略有修正，採「單軌多枝」的型態，但仍充分發揮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，及基於創新與彈性原則，使各級各類的學校均能適應社會變遷需求，並強化實際運作效果。唯現尚未定案，何時開始實施，以及施行效果如何，則均有待。

二、楊先生的參與及貢獻

我國現代教育的演進。已略如右述；茲進而談到楊先生的參與及貢獻，則如楊先生在其所著「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」（傳記文學叢書之九八，六十九年）的「前言」中所說的：「我的一生生活可以分爲四個階段：第一階段爲求學與教學，自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二年；第二階段服務於監察

院，自民國二十二年至民國四十三年；第三階段在考試院工作，自民國四十三年至六十七年；現在為第四階段，仍回到教學、讀書、寫作的生活。」其一生九十年的經歷，可說與中國現代教育演進的過程，有極為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。即使是早年在中國現代教育奠基的草創期，楊先生不及直接參與中國現代教育的醞釀與創辦，然而，楊先生「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」紀錄，自童年接受私塾教育，大學時代正逢五四運動，其後又留美研究教育，「實為中國早期教育蛻變最珍貴的史料」。至於後來過渡期的調整與健全期的發展，楊先生幾無一不親身經歷其事，並著有難以言說的貢獻。以下擇要錄述楊先生九十年來所參與的中國現代各時期的教育活動，及其所作的重大貢獻。

楊先生的啓蒙教育，據楊先生自撰的「青燈家塾憶童年」（同上書）所記，係在六歲（光緒二十六年）的那一年開始，附讀於一隣居李姓家塾；一年後，則在家自請家庭教師教讀，先後受教於王春茂與趙仲平兩先生。光緒二十九年，楊先生九歲，入其尊翁所自辦的養正小學；四年的教育，於經史國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養正小學畢業後，楊先生在巢縣縣立高等小學讀了四年，然後於宣統三年改入合肥廬州中學。民國四年夏，楊先生畢業於安徽省立合肥第二中學，於是乃束裝北上，準備投考北京大學。但抵達北平時，北大的考期已過，不得已入北大為旁聽生，一年後考為預科正式生，而償了「進京師大學堂（北大前身）」的夙願。楊先生在北京大唸的是文科的中國文學系，輔修教育（北大當時無教育系）。楊先生求學興趣的由中國文學轉變到教育學科，據楊先生在其「五年大學生活」（同上書）中所說：「這可能受了杜威博士來華講學影響，引起了一班人提倡教育改革，重視教育事業。」其後楊先生赴美研究教育，歸國後一生大部分的時間均在教育界服務，即種因於此。民國九

年，楊先生畢業於北大，獲學士學位；旋應聘至天津女師（前身爲北洋女師）任教國文。唯不及半年，突然接到安徽教育廳的電報，要楊先生回安徽擔任省立一中的校長，爲鄉梓服務。然由於地方不靖，學潮時起，適又遭逢母喪，楊先生乃於擔任一中校長一年零一個月後，赴美進修。（見「梓桐閣一年」，同上書）楊先生在美國留學，專攻教育；初入斯坦福大學，兩年後，以「中學課程的改造」爲題，提出論文，獲碩士學位，再赴美東，進哥倫大學深造，一年後又轉學紐約大學，於十六年冬提出論文：「美國州立大學董事會的組織與職權」，獲得通過，授予博士學位。十七年春，楊先生回國，即出任河南省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主任；爲期僅有半年，適逢上海中國公學改組，胡適之先生出任校長，推薦楊先生擔任副校長，實際負責校務。楊先生在擔任中國公學副校長這一段時間，切實整頓，一方面調整系科組織，一方面羅致學者教授，並積極培養學生的讀書興趣，成效卓著，僅僅一年，學生人數由原來的三百餘人，增加爲一千三百餘人，使楊先生信心大增，覺得「主持教育的人，應當明瞭所謂教育行政，其最終目的無非使學生在良好的環境底下，得到良好的教學，不能做到這一節，甚麼都是無益於事的。結果，徒然使學生程度日低，學風日壞罷了。」（「吳淞江上——我在中國公學一段辦學的經歷」，同上書）胡先生一度向人表示，希望由楊先生繼他來主持中國公學，但由於楊先生出任安徽大學校長職務，而沒有實現。

關於楊先生出任安徽大學校長的事，完全是事出偶然，亦非其所願。起因是民國十八年秋，安徽大學改組，由武漢大學副校長王撫五（星拱）先生兼任校長；王先生函約楊先生前往安慶出任文學院長，協助籌劃，本是暫時性質，但由於王先生仍兼武漢大學副校長，須回武昌一行，校務遂委託楊先

生代理。不料王先生離去不久，安徽政局發生變動，而王先生又遲遲不歸，於是十九年暑期後，楊先生乃正式繼任校長。楊先生接任之後，力謀校務的發展，曾在提高教授素質與培養優良校風方面，下過不少工夫。（見「百花亭兩年」，同上書）在提高教授素質方面，楊先生一方面向京滬一帶羅致一批學者來安大任教，以增強教授陣容，一方面提高教授待遇，以安定其生活。當時楊先生所禮聘的教授，都是一時碩彥，如：常導直任教務長兼哲學系主任，王陸一任文學院長，張慰慈任法學院長，丁緒賢任理學院長，陸侃如任中文系主任，朱湘任外文系主任，劉英士任政治系主任，童冠賢任經濟系主任，陳顧遠任法律系主任，何魯任算學系主任，陳景琪任化學系主任，夏敬農任物理學系主任，其餘尚有程仰之、蘇雪林、查良鑑、張慶楨、馮阮君、謝子堯、薛良叔諸人，不但水準甚為整齊，而且待遇還超過上海及其他地區。在培養優良校風方面，楊先生致力於提高學生的讀書興趣；而要提高學生的讀書興趣，最好的辦法，楊先生認為莫過於鼓勵學生辦雜誌與組織各種學術社團。因為辦雜誌，需要發表文章，而由於要發表文章，便直接地促使學生多讀書。又組織學術性的社團，學生們有參加各種活動的機會，心身皆有所寄託，精力亦可以發洩，便自然而然地興趣盎然，而不生雜念。這套辦法，楊先生在中國公學及安徽大學都施行得非常成功，因此楊先生事後檢討，認為這是他辦理高等教育的一點心得。事實上，楊先生的經驗，至今仍是一般大學校長所當奉為主臬的。

民國二十年，楊先生辭去安大校長職務，應母校之聘，回北大任教，並兼教育系主任；為期兩年。因為北方時局不靖，且家眷仍在故鄉，於是楊先生又回到南方來。時于右任先生任監察院長，特薦為監察委員，在南京任職，同時在金陵大學兼課。在此期間，楊先生雖然出任公職，但因仍在金大

兼課，故不但教學的活動沒有中斷，就是研究的工作也持續進行；其「教育局長」一書便是在那一段時間內完成的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抗日軍興，楊先生先後出任皖、贛、閩、台數省監察使，雖不直接擔任教育工作，然於地方的文化與教育事業，仍極爲關注，且獻替良多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楊先生於出任公職十五年之後，又回到教育的工作崗位上來，第二度出任安大校長。這時安大已改國立，且是駕輕就熟，按理應該是較上次更爲得心應手，然而，事後回憶，楊先生却認爲這是他辦教育以來最不如意的階段。因爲三十七、八年，正是大陸軍事逆轉，經濟破產的時候，幣制貶值得非常的快，教職員與學生的生活，極不安定，都必須校長多方設法加以照顧。這樣差不多應付了一年，終於撤退來臺。抵臺後，楊先生受聘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師大前身），主持教育系系務，同時兼任監察院秘書長。四十二年秋，楊先生因病請辭監察院秘書長；次年，改任考試委員，並續在師大兼課。對楊先生來說，這是一生中又一次大的轉變；一方面是楊先生自此在考試院工作了二十四年。（二屆考試委員，一任副院長，一任院長）爲一生服務最久的機關，而卸任後又經總統聘爲資政，一方面則楊先生先後在師大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兼任講席，三十年來，作育英才頗多，今天在臺灣教育界工作的同仁，鮮有不親炙其教誨，而受其裁成的。尤其值得後進景仰的，是楊先生近二十年來孜孜不倦的著述，經常不斷有新書出版與論文發表，其充沛的治事精力與嚴謹的爲學態度，無論識與不識，莫不推服。前後二十年之間，楊先生完成的重要著述或翻譯計有：譯克伯萊「西洋教育史」（協志、五十四年），全書五十萬字，爲目前大學用書中銷路最廣者；發表「國父教育思想的系統研究」（「國父百年誕辰論文集」，五十四年）正確而平實的詮釋國父的教育思想，還國父教育思

想的本來面目；與孫元曾先生等合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「教育計劃的經濟與社會因素」(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al Planning，五十五年)，為國內有關教育計劃討論的嚆矢；出版「教育學研究」(商務，五十七年)，檢討教育上的一些基本問題，如意義、功用、目的等，於教育觀念的釐清，諸多助益；主編「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」第八冊「教育學」(商務，五十九年)，有系統地整理與介紹教育資料，簡明扼要，極便參閱；出版「中西教育思想之演進與交流」(商務，六十一年)，比較中西教育思想之異同，並檢討其演進及交流情形，取材精當，見解獨到，當前國內教育界能探究這類題目的，除楊先生外，不作第二人想；「先秦文化之發展」(商務，六十七年)，討論此一時期文化、政治與學術思想之來源與演變諸問題，分開每篇可以獨立，合起來又是系統之作；印行「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」(傳記文學叢書之九八)，回顧早期三十年由私塾，而小學，而中學，而大學，以至赴美留學的求學生活，以及返國後教書、寫書、與主持大學行政的親身經歷，詳盡道來，內中諸多鮮為人知的事實與消息，為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最珍貴的史料；「孔學四論」(聯經，七十二年)，分論「學」、「知」、「時中」、與「正名」諸問題，以孔子的話解釋孔子，而且言必有據，不驚高遠，不尚新奇，最能把握儒家學說的精髓；又重印「五四——第一部五四運動資料」(傳記文學叢書之一〇二)，雖係六十多年前的舊作，然却是有關「五四運動」的最原始資料，也是瞭解「五四」的最正確紀錄。除此而外，楊先生歷來參與教育政策所發表的意見，參加學術會議宣讀的論文，以及其他專題演講的講辭等，更不知凡幾，必須等待將來年譜或全集出版的時候，才有完整的紀錄。

楊先生自六十七年交卸考試院長的職務後，平居以「讀書」、「教書」、與「寫書」自相期許，三者相互爲用，同時用功，以楊先生學養之深厚，益以數十年的經驗與心得，其成果的結晶，將不僅爲楊先生個人傳世之作，也必是中國近百年教育史的最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。舉例而言，楊先生目前手頭正在進行的兩項工作，一是年譜與自傳式的回憶錄的撰寫，一是中國文化史的著作，一旦完成，定將傳頌一時，並可垂之久遠。準此以論，以楊先生爲中國當代教育界的泰山北斗，實可當之而無愧。

三、中國教育的未來展望

中國現代教育的興辦，自同治元年迄今，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在這一百多年演變的過程中，中國現代的教育，由草創期的奠基，而過渡期的調整，以至健全期的發展，進步與成就頗爲不貲，堪以爲慰；就中近三十年來的積效，已爲復國建國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，更足自豪。然而，教育的進步是永遠沒有止境的，在發展的過程中，不斷有新的問題發生，處置稍有不慎，缺點便立即暴露。這次我們以「中國教育的展望」爲題，徵文爲楊先生祝嘏，計劃的重點有三：(1)現況的敘述與檢討，(2)國際的介紹與比較，(3)未來的趨向與展望；冀能自現況的敘述與檢討，暨國際的介紹與比較，尋繹並展望我國教育未來發展的趨向與前途。楊先生一生參與我國現代教育的活動，其平居教書、寫書、以及在各種場合所發表的意見與論著，不僅範圍廣泛，內容豐富，而且見解精到，影響深遠；而諸學長親炙教誨，心得良多，發表爲文，亦莫不各有所見。撮而論之，約有以下數端：

(一)道德與愛國

在教育史上，古今中外的教育，莫不重視道德；甚至以道德的完成為教育的首要之務。我國禮記學記以為「教者，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也」；荀子亦說：「以善先人者，謂之教。」這與西哲亞里斯多德所言「各種學藝，皆以善為目的」，可謂不謀而合。楊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，於道德教育最為重視，在「古代教育兩種優良的傳統」（中西教育思想之演進與交流）中，曾三致其意說：「古代中國教育與早期的希臘羅馬時代的教育，同是以道德培養為整個教育的目的。」而另一優良傳統——「行」的教育，亦是注重道德的實踐，「因為道德是講實踐的，必須用『行』的教育方法，方能達成其目的。」歸結仍是道德教育。本論文集中有關道德教育與公民教育諸文所研討的，均是從比較的觀點，析論古今中外道德教育理論與實際的演變，以探求精當的道德教育理論及有效的實施方法，藉供參擇。

談到愛國教育，中國現代教育的興辦，其動機即在於變法維新，救亡圖存。故在創設之初，中國新式的學校無不以富國強兵為當務之急。惜乎早期主其事的維新人生，過於切功近利，變法不得其要，以致未收教育救國之效。其後，自清末迄今，我國所有學校教育的設施，均以「建設國家、復興民族」為總鵠的；僅不同的階段，有不同的重點而已。楊先生在「教育史之分段與近代教育之發展」、「教育史上的一面鏡子」、暨「近代我國教育思想之演變」諸文（同上書）中，對此有精要的敘述；尤其在「教育史上的一面鏡子」中所說的「德國最初誤於妥協政策，而遭受慘敗。但德國在慘敗之後，竟能激起日爾曼民族精神之高潮，朝野上下，共同認定教育為雪恥復國唯一的原動力。」其重視愛國教育的意向，更溢於言表。集中有關各級各類教育諸文所論述，均與此一旨趣符合。